

抗日怒火在公共体育场燃烧

陈 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人民愤怒了，各界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迫于群众压力，在9月24日于上海公共体育场（现沪南体育场）举行上海市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当天全上海停工、停业、停课。据当时报载，参加团体有八百多个，人数达廿万人。体育场内已无立足之地，场外马路上也都站满了队伍。

这次大会，国民党市、县各级党部都有人参加。上海各界人士也都参加，大学如复旦、大夏、大同、暨南、持志、法学院、沪江、同济等，中学有上海、敬业、市北等，职工方面如邮务、卷烟业、针织业、棉织业、造船业、药业等，群众团体如宁波同乡会、国货维持会等，《新闻报》、《民国日报》、《申报》等报社，妇女界也有全国女子职业学校联合会、妇女救济会等，还有外国团体如韩人团体、印度国民党同盟等也都参加了。当时大会主席团有王晓籁、虞洽卿、方椒伯等，总指挥是朱学范。大会主席王晓籁首先报告说：“东北沦亡，举国震惊，我国民对此凶暴之日本，均认为不共戴天之大敌……须知东三省一亡，则我国之大难必将千百倍于今日，故际此千钧一发之秋，民族绝续之交，我四万万国民应本存亡有责之大义，一致奋起，宁为炮灰，不作亡奴。”报告之后，抗日救国会的委员一致宣誓。大会还通过了十三项议案。第一项就说：电请中央限令日军兽兵退出占领的各地，否则对日断绝邦交，宣告战争；其第七项又说：电请中央颁发明令，如有奸商买卖

日货,以危害民国紧急法治罪,严予惩办;第九项又说:电请中央实行征兵制,确定义勇军为永久组织,并发给武装,以为政府后盾;第十一项还说:电请中央决定外交方针,即以日本为公敌;第十三项还说:对于中央请求各案,责成抗日救国会推派代表携带呈文于二日内赴京请愿。大会提出口号称:农、工、商、学团结起来,督促政府出兵抗日;督促政府收复失地;督促政府驱逐日兵。大会发表宣言称:“此次日本帝国主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然出兵东北强占我国土,惨杀吾官民,劫掠吾财产……噩耗传来,人人发指,凡我民众,莫不慷慨激昂,同仇敌忾,誓不与共戴天……当必泣血枕戈与日寇决一殊死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同日,东北同乡会则在虹口召开全体大会提出:“反对不抵抗及秘密外交,请求政府对日正式宣战”。从这两个大会中,都可看出人民对日寇侵略的愤怒,同时对政府的不抵抗的不满。

大会之后,由于上海市民对日寇侵略的仇恨,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不满和不信任,许多人就组织了义勇军。11月10日,上海市抗日救国义勇军又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大检阅。据报导当时义勇军有八、九个团之多,这次到会参加检阅的是编制就绪的军队,计有第一、二、三团,一千九百余人;独立团一、三两个营,一千多人,共计三千余人。他们主要由亚美绸厂工人及二区市民联合会、煤业同业公会等工人、职员及市民组成。检阅后又举行宣誓,宣誓后有一代表致词说:“日军以十万侵略辽东,而中国二百余万军队竟不能抵抗,殊为憾事,今日吾民众自己组织义勇军为政府后盾,确甚需要……。”这已明确地表明人民已不相信国民党政府当局的一套了。这些义勇军热情虽高,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与领导,虽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就涣散了。但值得一提的是,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抗日救国会的一名候补委员王屏南律师,却及时组织起一支二百人左右的

义勇军，直接与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联系，在十九路军的领导下，在宝山吴淞一带配合作战，取得了小胜。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作祟，十九路军虽英勇作战，屡创敌军，终因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粮尽弹缺，腹背受敌，只得撤退到第二线，义勇军也随十九路军转移到苏州，最终被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王屏南仍回沪重操旧业。王屏南墓现葬于宋庆龄陵园内众烈士墓地中，与“四行孤军”谢晋元将军墓为邻。

火烧蓬莱国货市场

徐颂德

蓬莱路上蓬莱国货市场，是住在小西门内何家弄匡庐主人匡仲谋先生所创办。他利用永宁地产公司购进的黄泥墙桃园 24 亩土地，于 1926 年筹建蓬莱国货市场，出租给各国产厂商作为经销的门市点。这对抵制日货、宣扬国货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 1930 年前后曾名闻全市，成为上海国货销售的中心。“八·一三”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南市老城厢，因恨它抵制日货，第一把火就焚烧了蓬莱国货市场，成为一片瓦砾。

“一·二八”淞沪抗战始末

施海根 沈仲奕

日本侵略者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大片国土之后，全国群情激愤，各地纷起抗日运动，抵制日货，要求政府收回国土。而日本亡我之心与日俱增，意欲得寸进尺，籍口所谓中国反日，派遣军舰至上海耀武扬威，制造事端。1932年1月18日，日本僧侣多人在上海化缘，日本驻沪武官收买无赖，殴伤日僧，日驻沪领事以此籍口，声称中国排日，要求上海市政府封闭“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和《民国日报》，又于1月26日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道歉赔偿，惩办凶手，制止反日运动，限令四十八小时内答覆。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毫不退缩，于1月23日会同淞沪警备司令部在龙华联合召开上海各部队营长以上军官会议，商议对策并作出部署。而上海市长吴铁城为避免事态扩大，于1月28日如限答覆日本驻沪领事，表示完全接受所提要求，日领事村井表示满意。可是，日军遣华舰队司令官盐津少将却以“护侨”为籍口，于是夜十一时廿五分通知上海市政府，要求中国驻沪第十九路军退出闸北，并在市政府接到此通牒前十五分钟，以海军陆战队及便衣共四千余人，分四路向闸北五区警署、虬江路、青云路和天通庵等地发动进攻。蔡廷锴将军当即命令驻闸北之第七十八师所属各部队坚决还击，并通电全国，告海内外同胞，声讨日军侵略罪行，表示“为卫国守土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我守军

勇猛异常，冲锋陷阵，当晚用手榴弹击毁了冲入闸北宝兴路的三辆日军装甲车。

当晚午夜，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连夜步行至真如，设军部和总指挥部於真如火车站西首的花庄。1月30日，蔡廷锴将军在真如军部接受记者采访，他情绪激昂，决心抗战到底，对各报记者说：“过去我们打了许多年内战，坐视东北沦陷，人民遭难，实在对不起国家。今天对外作战，民心、士气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打出中国军人的威风来，为中华民族争人格！”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以精锐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编成第五军，由张治中将军任军长，驰沪声援，为顾全大局，将淞沪抗战作为地方事件，故第五军亦用第十九路军之番号。

第十九路军的浴血抗战，得到上海各界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宋庆龄、何香凝等率众亲往十九路军军部，慰问前线抗日将士；上海各界人士在战事爆发后，筹组了数十家伤兵医院，专门收治受伤的抗日将士，上海妇女团体发动全市妇女，仅化五天时间，赶出三万套棉衣裤，送往前线供将士御寒；上海部分市民成立义勇军，前往军部要求拿起武器上前线杀敌。后方民心大振，前方士气高昂，日军连连受挫，使狂妄一时的日军司令盐津垂头丧气，“二十四小时完全占领上海”的狂言成为泡影。

2月6日日军增派第三舰队驰抵上海，调遣野村接替盐津，任侵沪日军司令。野村集中上海的陆、海、空全部兵力，转而进攻吴淞，欲先强占吴淞。经中国守军一周奋战，野村先占吴淞之计亦落空，遭到盐津的同样命运。2月中旬，日军又派植田谦吉中将率第九师团，下元熊弥少将率混成第廿四旅团抵沪增援，植田任第三任指挥官，向我军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军队停止抵抗，撤出第一道防线。同月19日、20日，植田以全部兵力向闸北、庙

行实施全面突击。第十九路军集中优势炮火，猛烈轰击日军阵地，驻守在庙行的第五军八十八师亦予以坚强反击，挫败了日军的进攻，2月24日，蒋介石两次致电慰问，称：“自经庙行一役，我国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赞我军英勇。”植田之大举进攻亦遭挫败，且其海军“出云”号旗舰也被十九路军敢死队员潜水炸伤，故使日军当局甚为震惊。

2月29日，日军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率领第十一、十四两个师团编成的上海派遣军抵沪，此时，日军侵沪总兵力已达七万余人，飞机二百多架；而我军五个师，总兵力约四万人，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日军对闸北、真如地区实施狂轰滥炸，并于3月1日乘我浏河守军薄弱之机强行登陆，向我军左后方发动攻势，致使我守军腹背受敌，南京国民政府又迟迟不派援军、不供军饷弹药，为避免吴淞、江湾、闸北等处守军陷于被包围，故放弃了苦守三十多天的防线，于3月1日23时，中国守军退至二线。

当时上海，是中国最大国际港口，日军发动侵沪战争势必影响各国对华贸易，故英、法、美等国家要求中日停战、撤军，遭到日本拒绝。各国舆论谴责日本侵略行径，美国朝野亦指责日本，“国联”十二国理事会也要求日军撤出，此时日本亦受到中国军民坚决抵抗，不像“九·一八”事件那样轻易地在上海取得利益；而南京国民政府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急于打内战，亦无意再战，故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中日两国于当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大、中学生赴京请愿与抬棺游行

金 名

1931年9月24日在公共体育场召开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之后,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这样就激起了上海市大、中学生的不满。11月22日《申报》报导:本市各大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在南市少年宣讲团开会,议决:于本月23日由各校自由组合代表团赴京,督促政府出兵,并宣誓:“不达目的,誓不生还”。同时《申报》又报导:“昨天(21日)上午十时在西门公共体育场集会,到会学校(中学)约四十余所,男、女学生一万余人,前去参观的机关来宾及民众不下十万人。”那次到会的南市中学就有:私立中学1600余人,清心男中200人,私立女中400人,明德中学10人,大同中学400人,敬业中学400人,清心女中代表4人等。他们通过的议案有:(一)请政府立即出兵援马(占山);(二)警告失地长官张学良……并令带罪立功;(三)请政府实行武力接收失地;(四)请中央发枪给各中学义勇军;(五)联合全市各界赴京请愿;(六)请国府即日公布对日方针;(七)保护民众运动……等。并提出大会口号:(一)督促政府出兵抗日;(二)对日本经济绝交;(三)誓死收回东北领土;(四)青年一致武装起来;(五)加紧抗日救国工作;(六)农、工、商、学团结起来;(七)读书不忘救国;(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会后又进行了游行。

但是,同版《申报》又刊登了“市党部劝阻学生赴京请愿”的训令。全市大、中学生则不予理会,仍坚持赴京请愿。

11月24日上海各大、中学生开始分批乘火车赴京,上午各大、中学生分别在南市、闸北游行声援;下午八千余学生集合北火车站分批出发,至25日晨1时15分第五批完全启程;《申报》当时报导:各队秩序均整齐,情绪悲壮异常。说:“此行目的请政府即日出兵抗日。”还说:“本市各大学及各中学学生抗日救国两联合会,鉴于国难日亟,暴日进攻有增无已,而我政府民众不一致,奋起抗日实不足以救亡,故该大、中校抗联会于日前组织督促政府出兵代表团。”

报纸报导在南市进行游行声援的队伍集合于公共体育场,当时总指挥是交大学生,总纠察是大夏大学学生,参加的大学有大同150人、两江女子体专120人……,赴京请愿的有:大同大学25人、两江女子体专56人,中学有大同附中50人、清心男中180人、清心女中9人、敬业中学80人、明德中学7人、私立中学257人、中华职业有158人。

大、中学校学生到达南京后,会同各地大、中学校学生,向国民党政府当局及国民党党部请愿,遭到国民党政府出兵镇压,死难学生30余人,这就是南京珍珠桥事件。其中,上海文生氏英专学生杨同恒牺牲,学生最终被押运回上海。

1932年1月10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又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赴京请愿被难同学杨同恒追悼大会”。各界参加者达数千人,由赴京学生报告烈士被难经过。是日天阴而晦,朔风凛冽、旌幡飞扬,会场空气非常悲壮。会场中除女学生外,各界妇女参加者甚众,都为之悲泣不已。报告完毕,全体与会者向杨遗像三鞠躬,主席献花之后,学生即抬着杨同恒灵柩出场游行。同学抬棺游行,引起华界及英、法租界当局紧张异常,慌忙派出大批探捕沿途监视,甚至出动红色铁甲车及武装警察,荷枪实弹,缓缓跟随游行队伍,至百老汇路(今大名路)被驱散。

公共体育场上的抗日歌声

陈 金

刘良模同志是1932年上海沪江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在全国青年会工作，当学生干事，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在青年会中教群众唱歌。当时他受到“一·二八”事件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鼓舞，积极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1934年冬，在四川路青年会创办了一个民众歌咏会，参加的都是附近银行、邮局等机关、商店的男女职工、学徒，开始仅几十人，后来参加的人愈来愈多。以后又在八仙桥青年会也举办了民众歌咏会，二处共有八、九百人参加。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及地下党员音乐家吕骥、王莘、麦新、孟波等同志都曾先后到歌咏会工作过，他们或作曲，或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民众歌咏会以后又参加了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当时上海歌咏组织很多，为了配合形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同时检阅歌咏会的力量，决定在上海筹组一次群众抗日救亡歌咏大会。要开歌咏大会首先就要借一处能容纳数千人的场地，原先想借麦伦中学操场，因为受到英租界巡捕房的刁难，最后只好借到了公共体育场。

1936年6月7日上午，到公共体育场参加歌咏会的有五千余人，他们都是来自机关、银行、商店的职工，以及工厂的工人和农村、里弄的群众。但国民党当局却想方设法进行阻挠。他们在体育场中组织了一场足球比赛，群众到达时球赛正在进行，歌咏会群众就装着看球，时间一到，就不约而同地一下涌进了足球场，大家拿出带来的旧报纸，铺在地上坐了下来，这样一来，足球

赛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同时，有一千多名歌手都集中在球门那里排好队伍，有人搬了一张排球裁判用的高凳放在中间当作指挥台，刘良模同志就站在高凳上指挥大家唱起抗日救亡歌曲来。歌咏大会就这样开始了。

正当大家慷慨激昂地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时，突然，来了许多持枪的警察，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于是他们拿起话筒对警察喊话：“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大家都爱国，我们今天唱的都是爱国歌曲，不信，你们听！”于是大家都引吭高歌，唱起“大路歌”、“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一支又一支抗日救亡歌曲。起先，警察都持枪站在一边与群众对峙，然而整齐有力的歌声却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当群众唱起“打回老家去”的时候，有些东北籍的警察也禁不住掉下泪来。当群众高唱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时，警察已与群众一起唱成一片了。在场的中外记者向全国报导了这个消息，散会后大家排成整齐的队伍，一边走一边唱，继续把抗日救亡歌声传到大街小巷。

注：本文根据 1982 年第三期青运史资料中刘良模同志回忆文章摘录整理。

南市大火目击记

自我军撤退后，南市即被敌军纵火焚烧，一直到今天（指1937年11月17日）还没有熄灭，而且火势愈烧愈烈。大东门的火，现在已经由大码头街向南栈烧去，斜桥一带烧至海潮寺，要算这一段火占地最广，它的长度几达三里之遥。

深夜，站立在较高的大厦中，可以望见南市冲入云间的火焰，那火焰一望无涯，激荡中的火势，就仿佛大海中被暴风雨掀起的波浪，我们眼看一栋栋房子被火舌吞进去。一会儿，数十栋，数百栋的房子，融化在火舌中了。冲出这火舌的，只是一股无质的青烟，无数个同胞多少年来血汗，变成了青烟，无数个同胞的生命，葬送在火窟中了。

这仇怨，将永远地刻划在我们心中！

记者昨天曾亲眼看见了一群从火口中逃出的难民，他们真可以算得是体无完肤了，没有一个人不被火烧伤了。有的半边脸被火烧焦了，有的整个头发被烧去了。从他们口中知道他们是从林荫路大林路一带跑出来的。敌人到达南市后，即沿街沿巷放火。前天晚上，火势便由大林路烧到了林荫路，他们躲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已经两天两夜没吃食。起先他们听见街上我军英勇的喊杀声，后来这声音和机关枪声渐渐消失了。不久便听见敌人的坦克车咬着柏油路轧轧的声音，等这声音过后，他们正准备跑出来时，忽然炮弹象雨一般地落在他们的房子附近，于是他们只好继续躲在屋子里，这时他们差不多都饿倒了。外面起火时，他

们全不知道，一直到火焰冲进屋子，他们才开始跑。那时，他们已顾不得路上的敌军了，敌人就在大林路大吉路口架起两架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他们中一部分人死在敌人的机枪下，只要是被射中的，没有一个跑得出来。他们经过黄家网路、桑园街等处才跑出来，这些地方没有一处不是大火。

据他们中的一个说，在桑园街附近的某处，已经有汉奸的机关成立了，插着与太阳旗相仿的大旗子，汉奸每人手上握着一根大棒，把持在马路口。他们亲眼看见汉奸在桑园街某段放火，一面放火一面抢劫，在路上的汉奸差不多每个人手上都提着很多东西。

南市已整个地变成了焦土，这真是空前的浩劫。

沈孝铨摘自 1937 年 11 月 17 日《救亡日报》

日寇毀我繁华南市

施海根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南市受到日寇近三个月的狂轰滥炸，据作者从当年报纸粗略计算，前后日机轰炸达十九次之多，投掷大量炸弹及烧夷弹。特别是十一月十日，闸北、浦东被日军占领后，日寇即动用陆、海、空三军力量，向南市发动进攻，三十余架飞机在南市各处投下百余枚炸弹、烧夷弹，日陆军在浦东沿江十二华里长的地段，设四、五门大炮加上海军兵舰，同时向南市实行排炮轰击，致使十六铺以南沿江一带连续燃烧三日三夜。昔日最繁华的里、外咸瓜街成了一片焦土。南火车站原有建筑甚为壮丽，却被炸成一片废墟，到处是死者的断手残肢；上海闻名的临江花园——半淞园，也只剩下一个二十余公尺高的土山，亭台楼阁园中文物全部被毁；南市华商电气公司（包括电灯、有轨电车）全部被毁；华商内地自来水公司也受到极大的破坏，南市各种公共设施均被破坏。原来繁华的南市变成无电、无水，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焦土，从大东门内可以看到黄浦江上船只的“死市”。

更惨的是，日军攻进南市时，又一次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掠夺。除划为“难民区”的老城厢方浜路以北地段外，城内大半变成焦土，沿江城区几乎延烧一空，连位于大南门的交通部上海电话局也难免一焚，其西首江阴街、东首小南门佛阁街、糖坊弄等悉化为焦土，连日被杀的死尸二、三百具，均被投入烈火之中焚去，以代掩埋。

当年的《申报》对南市所遭的这场浩劫，先后作了两次损失估价的报导。一次说：“南市的全部房屋几全被毁，流离失所者达二、三十万人，其状之惨，实举世罕见”。另一次又说：“南市、浦东二地遭此空前浩劫，所受损失总计达五万万元以上”。

李国瑾烈士传略

李国瑾，上海人，生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九日。一九三八年在敬业中学（南方中学）高一普乙读书。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十八岁。一九三九年九月，他便离开上海，前往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任中共太仓县何市区委书记，改名李田文，在常熟、太仓一带从事抗日斗争的民运工作。一九四〇年七月，中共太仓县委成立，李田文被委任为青年部部长。八月下旬，“江抗”五支队侦察参谋浦太福，秘密宿营于冯家桥枇杷园。李田文即往枇杷园与之分析敌情，不料被敌伪发现，日寇即派一个班带领伪军一个连于二十八日拂晓突然包围我部。我部队突围后，李田文自己却陷入重围，不幸被捕。带队的日本鬼子逼他供出我军的活动情况，李田文同志大义凛然，傲然挺立，既不暴露自己身份，也不理睬敌人的淫威，使日酋一无所获。豺狼成性的日寇恼羞成怒，当即对他连砍二刀，并举枪逼他到敌人据点去。李田文坚贞不屈，站立不动，日寇又向他开了两枪。李田文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时他才十九岁。

（摘自《南市英烈传》 葛明沧整理）

南火车站被毁始末

沈仲奕

“八·一三”之前，上海有两个火车站：一是北火车站，在闸北，为沪宁线的起点站；另一是南火车站，在南市，是沪杭甬线的起点站。

南火车站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地点在今南车站路、中山南路一带（原名车站前路），占地275亩，房屋十分壮丽，高三层，当时造价高达五万金。车站内有候车室及雨篷月台三座，南北方向的天桥一座，牲畜台一处，另有机车库房、货栈等建筑多处。1916年，沪宁铁路与沪杭铁路两路接轨，大大方便了南来北往的旅客，火车乘客量骤增。据《民国上海县志》记载，两路接轨的第二年，沪杭路的年乘客量由111万人次增至450万人次；至1922年又增至600万人次。后来沪杭铁路延伸到浙江宁波，称为沪杭甬铁路，乘客量又有较大的增加。可见抗日战争前的上海南火车站，作为上海铁路交通的枢纽之一，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八·一三”抗战爆发，当时南火车站毫无军事设施，每天有成千难民在车站候车，准备逃离上海。据当时的《申报》报道日机轰炸情况：“8月28日下午2时10分，先是两架侦察机引道，然后是轰炸机两小队计六架，突然飞至南火车站上空，向待车的平民滥掷炸弹，共投弹二十余枚之多，结果当场炸毙者，约二百五十人以上，伤者倍之，所有待车出发之难民，几悉数罹难，伤心惨目，凄绝人寰。”南火车站被炸之惨状，《申报》记者实地采访后作

如下记述：“残毁之旱桥哀哀泣诉，沿途炸落之电车电灯各线已满街心，密如蛛网；站东之路局储水亭，千孔百疮，酷似一座特制的蜂巢；南首货站屋顶，亦毁去过半；入月台，悚然于眼帘者，满陈棺柩，累累箱笼，狼籍不堪，残骸断肢，血迹犹新……”之后，日军飞机和兵舰多次对南市地区狂轰滥炸，至上海沦陷前，“南火车站一带，亦半成焦土”（见1936年11月12日《申报》）。从此南火车站废弃无法使用。

昔日繁荣的上海南火车站已荡然无存。如今在火车站原址已造起了成片的居民新村，仅有与车站有关的南车站路、车站支路等几条马路名称，成为日本侵华的见证。

南市难民区

郑少民 沈士伟

1937年8月13日上午,日本侵略军悍然向我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发动进攻。我军当即迎头痛击,上海地区的抗日战争就从此开始。一批居民相继到租界避难。8月22日凌晨,日飞机在南市、浦东一带活动频繁,先有二架侦察机窜至南市十六铺侦察,继有数架轰炸机投掷巨型炸弹数枚,南市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大批居民纷纷逃往租界及外地避难。“8月28日下午2时10分,先是两架侦察机引道,然后轰炸机两小队计6架飞至南火车站(今南车站路中山南路口)上空,向待车的平民滥掷炸弹,共投弹二十余枚之多,结果被炸毙者约在二百五十人以上,伤者倍之,所有待车出发之难民,几悉数罹难,伤心惨目,凄绝人寰。”根据当时报纸记载资料的粗略统计,日寇飞机先后对南市实施狂轰滥炸有十九次之多,投掷炸弹和烧夷弹,并用机枪扫射,惨杀无战斗力的平民,炸毁非军用之房屋,到处烟雾弥漫,火光冲天。南市居民向租界逃难形成高潮,租界人口激增,原有租界难民收容所已人满为患,租界当局担心难民闹事,影响社会治安,也怕日寇寻衅,趁机进入租界,动摇他们近百年来在华苦心经营的据点。于是,法租界在沿界路口装了铁栅门,架设铁丝网,增派军警,加强岗哨,以阻止难民大量进入租界。那时,老西门、老北门一带的民国路(今人民路)上挤满了受冻挨饿的难民亟待救济。

由于难民大量拥入租界,高峰时达70万人。虽然当时上海的慈善团体、宗教组织、同乡会等,在爱国人士的倡导推动下,纷